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历史学（第二辑）

社会变动论

〔美〕P. Sorokin 著 钟兆麟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· 历史学（第二辑）

社会变动论

〔美〕P.Sorokin 著 钟兆麟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社会变动论/(美) 索罗金著; 钟兆麟译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历史学)

ISBN 978-7-5520-1274-3

I. ①社… II. ①索… ②钟… III. ①社会变迁—概论 IV. ①K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1916号

社会变动论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

电话总机: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400千字

印 张: 40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0-1274-3/K.326

定 价: 178.00元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一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还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于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，于阳光新景寓所

[美] P. Sorokin 著 鐘兆麟 譯

社會變動論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

譯者序

自從工業革命物質文明發展以來，對於人們的思想上和社會的結構上，都開創了新穎的境界和範疇。自然科學的發達，使人們得以相當地認識自然現象，預測自然現象和利用自然現象。因此，一般人們即自命是了解「宇宙之謎」了。影響所及，於是別一部分的學者，也即追踵自然科學家之後，而要殫智竭力去揭破宇宙另一方面之秘密——社會現象；所以近數十年來，所謂社會科學的呼聲，並不亞於自然科學的呼聲。人類一方面要求了解自然現象，他方面也要了解自己所造成的社會現象，這是很自然的情勢。本書即是要求了解社會現象之一努力；申言之，也即是解答「社會謎」之一嘗試。這種努力這種嘗試，當然在學術史上，已經很悠久了；不過到了十九世紀，才漸次有比較健全的理論和科學的證據。

十九世紀以來在思想界和學術界中，出現了一個強烈的觀念，即是進化論。這個進化論對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，大家都認為這是很合於事實的學說。關於自然現象那方面，這裏按下不談，現在且來看一看社會這方面所表現的情形。社會是不是進化的？我想十九世紀以來的學者，大多數都是給與肯定的答案。如果社會既是進化的，那末進化的途徑是怎樣的情形呢？孔德斯賓塞毛幹（人類學家）和其他許多學者，都主張直線的進化；馬克斯昂格斯等，則主張辯證式的進化；柏格森則主張創造的進化；而近來毛幹（生物學家）亞力山大和會勒等則又主張層創的進化（此與辯證式的進化很相近）。然則，那一說是對的呢？抑是進化觀念根本未必可靠呢？這是一種異常嚴重的問題。本書作者即是試求解決這種問題之一人。自斯賓格勒的西方之衰落大著出世以來，轟動一時；因此，許多人對於進化一觀念，都覺得有重行考慮之必要。本書作者，或許也是多少受了斯賓格勒的影響，而至於反對社會進化論，也未可知。作者堅

特社會循環論，認為社會之行程，是一種波浪起伏式的表現。關於這種問題的觀點，誰是誰非，譯者恕不表示意見，惟有訴諸讀者自己之判斷。現在我謹將本書的要點簡單地概括於此：

(1) 循環說 (Theory of cycle) —— 本書的主要骨幹是和進化論相對的循環說。這一說是主張社會並非進化的，乃是週而復始的循環。各種社會現象在時間的大潮中，都會重演的。所謂「歷史不重演」的傳統觀念，在某種意義之下，作者是加以反對的。他舉了許多歷史事實去證明他的學說，讀者在本書中行將看到，這裏不便贅說。

(二) 階層說 (Theory of stratification) —— 作者認為社會的本體是有階層的。任何社會只要一開始有了相當的組織，必然會出現一些階層，自初民社會以至於平等主義者的團體，都避免不了這種情形。所以作者在本書中，再三申述階層是永久的，與社會相始終的。

(三)生物觀——作者在社會學上的觀點，似乎是屬於生物學派。他對於社會現象，一方面注重人的生理情況，他方面復以生物現象來比喻和解釋社會現象；因此，他即很自然地走到了主張人類應有「天然淘汰」的學說以及主張社會循環說。

(四)機械觀——作者對於歷史現象或社會現象，持一種定命論或機械論；認為過去是如此，將來也許仍然是如此（他雖未堅決地主張將來也必如此，然而他却肯定地認為並沒有任何理由，可以主張將來即不如此）。社會到了某種情形時，必然有一種機械的奉行故事的變動。人類在此時間大潮中的活動，只是代表歷史必然行程的進展而已。所以由此引申，對於人生的感覺，即不免趨於悲觀。

(五)歸納法與演繹法——在本書中，作者是兼用歸納法與演繹法的，對於一種現象或一個問題，他先陳述一種原則，或假說，然後即找到許多統計材料來

證明，由此復歸納於他的出發點並以此原則推及其他現象。所以他這種方法，也可稱之爲歸納的演繹法。作者因爲重視統計材料——申言之，即重視現象的數量方面，所以對於現象的性質方面，不免稍有忽視了。

上述幾點，似乎是本書中最重要的地方，爲便於讀者起見，故在此提及。總之，本書作者是經過了一番的努力，企圖對於「社會之謎」，得到相當的解答。他在本書中，對於社會現象，作了一個縱面的和橫面的綜合觀察；在社會科學中，這本書要算別開生面的；在社會學中，牠也要算是大著之一。作者在本書中提出了許多關於社會現象（和歷史現象）的問題，一一加以解答。這些答案固有未能盡滿人意之處，然而學者最要的態度，並不在完全接受某一種學說，乃是在對於某些問題及某答案，重行加以分析加以批評，並能找出由此所引申出來的別些問題，再加以解答。

譯者在此應加申明的，即爲求簡潔而便利閱讀計，對於本書原文中有些瑣細

的贅說的和無關重要的地方和統計材料，在譯文中稍有省略；然而這種省略爲數並不多，並且也毫不損礙於本書的理論。

最後尙要說的，即本書譯完後，承許多朋友幫助和校對，譯者非常感謝，恕未一一提名於此。譯者能力有限，其中錯誤和不妥之處，誠所難免。讀者如能賜以指正，那是歡迎之至。

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譯者

目次

導論

第一章 社會空間社會距離與社會位置·····	一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社會階層·····	一三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編 社會階層的波動

第一章 經濟階層·····	二三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 經濟階層的高度與側面之波動·····	三九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政治階層·····	八三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 職業階層·····	一二五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編 社會變動性